

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政治操弄与中国应对

张 佳

[内容摘要] “全球南方”作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备受瞩目的议题,其本义在于发展中国家谋求团结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议程。然而,随着“全球南方”整体实力的上升,美西方国家开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对“全球南方”进行重新定义,并采取一系列政治操弄手段,试图削弱中国其中的影响力,争夺和拉拢其他国家。这些操弄手段包括在话语层面将中国与“全球南方”区隔、扶持印度争夺南方国家内部领导权,以及拉拢特定国家导致“全球南方”碎片化。从效果来看,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不同地区或者次地区的战略竞争氛围,并促使更多南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立场。然而,从服务美西方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些政治操弄的进展相对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秩序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以及美西方国家自身能力的下降。面对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系列政治操作,中国应在身份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定位;战略上坚守发展议程在“全球南方”的核心地位;操作上要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和平台,整合“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效果上要注重实效,拓展合作领域,真正推动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 全球南方 战略竞争 中美关系 发展中国家

[作者简介] 张佳,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4)06-0047-21

“全球南方”作为当前热门话题,其本义是指发展中国家整体性成长并日益成为国际秩序中显著的独立力量。然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都试图从消除俄罗斯威胁、遏制中国的角度出发,通过争夺和拉拢广大发展中国家,重新定义这一概念。由此,“全球南方”逐渐被赋予更为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导致美西方

与中国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使用出现了本质的差异,对抗态势愈发明显。本文将深入剖析“全球南方”的由来及再政治化的过程,探讨美西方对“全球南方”进行政治操弄的主要策略、手段和实际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如何推动“全球南方”的发展议程,以确保在围绕“全球南方”的相关争论中保持主动性。

一、“全球南方”的由来与再政治化

“全球南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南方”一词最初是在1926年由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用以阐释意大利南北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明确指出“南方”相对于“北方”处于滞后状态。^①随后,“南方”这一表述被引申至国际秩序层面,专指长期遭受殖民统治与压迫、位于国际经济与政治体系边缘的亚非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国家力量分散且薄弱,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有效作用。然后,这一局面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来自亚非地区的30多个国家集聚印尼并签署了《万隆宣言》,不仅表达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关切,还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万隆会议及其形成的共同历史记忆成为塑造“南方”身份认同的起点,^②显示出“南方”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不排斥政治色彩,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20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不断升级。1964年,英国学者彼得·沃斯利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用以指代二战后寻求政治经济自主的新独立国家。面对这些国家的战略诉求,美国采取了以经济优势为诱饵的拉拢策略,^③而苏联也制定了相应的应对策略。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拉拢、挤压甚至压制下,发展中国家深感势单力薄,唯有“团结求生存”,由此,“不结盟运动”应运而生。同年3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成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定期协商贸易和发展议程的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所:《葛兰西文选(1916~1935)》,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27页。

② 简军波:《大变局之下的世界秩序:范式之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年第1期,第21~42页。

③ Peter Worsley, *The Third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机制性平台。会议期间成立的“七十七国集团”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独立主权、推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世界进入了探索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阶段。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这一表述也逐步替代了之前诸如“贫穷国家”“落后国家”“欠发达国家”等多样化称呼。^①1977年11月,时任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提议成立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并邀请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致力于研究全球发展问题,以促进南北之间的经济平等与合作。委员会指出,尽管“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具体挑战各不相同,但它们在政治上团结一致,认为彼此的斗争都源于全球经济和政治从属关系这一核心问题。1979年12月,勃兰特委员会发表了《北方和南方:为了生存的纲领》,^②将世界按照北纬30度划分为富裕北半球和贫穷南半球。这条北纬30度的“勃兰特线”深刻地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相对弱势和从属地位。此后,“南方国家”这一表述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南方委员会成立,其核心宗旨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方”在国际秩序中遭受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

要根本改善“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从属地位,发展成为唯一出路。在此期间,七十七国集团、南方中心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特设局开始采纳“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用以取代充满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的“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中间地带”等术语。中国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也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也相应地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化、机制化改革,以支持“全球南方”,设立南南合作办公室,使得“南南合作”的重点从“团结维护主权独立”转向了“发展”,并将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作为核心目标。其标志性成果包括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和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③

①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13~20页;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1期,第83~113页。

② Brandt Willy, *North-South: A Program for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0.

③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agenda/>.

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强劲的发展势头,崛起为新兴经济体,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据统计,新兴经济体的GDP占全球比重从1980年的24.3%提升至2020年的40.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80%。特别是中国,从2013年至202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了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①据测算,到2050年,中国、美国、印度将稳居全球经济前三强,并与其他国家拉开显著差距,从而彻底打破欧美+日本等传统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格局。“全球南方”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进步。这种经济多极化趋势以及传统发达国家主导地位可能丧失的前景,迫使美西方国家从战略竞争和国家安全视角来看待这一变化。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且有意愿挑战国际秩序的战略竞争者”。^②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将中国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③因此,西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发展进程的约束和调节意愿空前高涨。

面对美西方国家再度施加的约束与控制,“全球南方”国家展现出了日益增强的独立自主意识,这一趋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尤为显著,体现在他们拒绝盲目追随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立场上。2022年3月,联合国大会就“对乌克兰的侵略”决议草案进行投票时,包括中国、印度、南非、哈萨克斯坦等在内的超过50个南方国家表达了不支持的态度。同年4月,在关于暂停俄罗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的投票中,反对或弃权国家数量更是高达82个。2023年2月,当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时,已有130个国家宣布不参与。相比之下,2023年8月,“全球南方”国家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则彰显了它们推动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积极姿态。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全球南方”国家已不再满足于被动地遵循西方的议程设定,而是越来越倾向于从自身利

① 徐秀军:《新兴经济体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第49~79页。

②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③ Michael Martina and David Brunnstrom, “US Says Challenges Posed by China Exceed Those of Cold War,”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says-challenges-posed-by-china-exceed-those-cold-war-2024-09-18/>.

益出发,对国际事态做出独立的判断。俄乌冲突在粮食、能源等多个领域对“全球南方”国家造成了实际冲击,因此它们深知盲目追随美西方制裁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自身的发展能力。同样地,“全球南方”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也不愿意选边站,它们普遍认识到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对自身有益无害,而支持美西方对华战略竞争、围堵中国则有害无益。美西方战略界也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所展现的独立性和不合作态度可能会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①因此,他们呼吁要以新的战略性眼光重新审视“全球南方”的崛起,并意识到过去忽视或“恩赐式”的援助已显不足,亟需重新评估和调整其对“全球南方”的战略,以适应新的变化与需求。^②

这种战略性调整也日益凸显政治化和工具化倾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重涵义:其一,“全球南方”作为一支独立而非依从性的政治力量,其战略价值日益凸显,对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国需要投入更多的外交资源来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互动与联系。一些西方学者毫不讳言地指出,“全球南方”已成为中美、俄美等大国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关键战场”,^③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深深的历史和现实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方试图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④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也提出,西方有必要通过妥协和利益让渡来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⑤其二,“全球南方”的地理位置独特,拥有丰富的关键资源,特别是对全球绿色和数字转型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储备,这一点已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被重新审视。例如,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伊琳·波特就明确

① Pankaj Mishra, “The West Never Had a Chance at Winning Over the World,”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3-11-16/western-fantasies-of-wooing-the-global-south-are-dead>.

② Aaron L. Friedberg, “A World of Blocs,”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orld-blocs>.

③ Craig Cohen and Alexander Kisling, eds., “2024 Global Forecast: A World Dividing-Part I The China Challenge,”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1/240125_GlobalForecast_2024_ChinaChallenge.pdf.

④ Ibid.

⑤ Mohammed Soliman, “The West’s Values Are Important, But So Is Realism, Says Finland’s President,”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4/07/04/the-wests-values-are-important-but-so-is-realism-says-finlands-president>.

指出,欧洲对金砖国家的资源丰富有着迫切的需求。^①其三,“全球南方”内部或次区域的政治生态正在经历重构,新的权力关系和合作模式不断涌现,这也为美西方等外部势力提供了对其内部分化和政治操弄的空间。

然而,面对日益尖锐的大国战略竞争和美西方国家的战略意图,“全球南方”感受到了明显的选边站压力。不过,不同地区的选择存在差异:非洲和东南亚地区更倾向于秉承独立自主精神,与周边邻国加强团结合作,避免卷入大国间的战略纷争,尽可能将主要精力聚焦于发展这一主题;相比之下,拉美和太平洋岛国则因多种因素导致国内政局不稳,外交立场频繁变动,发展的稳定性和独立性相对较弱。

二、美西方政治操弄“全球南方”的具体策略

显然,如今的“全球南方”概念已超越了以“勃兰特线”为界的南半球发展中国家集合体和“欠发达”的象征性表述,也超越了万隆会议时期“第三世界”作为全球权力结构边缘国家群体的身份界定,转而成为一个关乎地理范畴、国际关系、结构特征和政治意蕴的构建名词。在此语境下,“全球南方”已不再是“西方凝视下的被动客体”,^②而是积极谋求自主命运掌控权的主体。这一转变标志着当前地缘政治结构已不再是美苏两极,也非冷战刚结束后的近乎单极态势,而是呈现出高度复杂化、碎片化且处于不稳定的流变状态。针对“全球南方”日益增强的独立性,美西方战略学术界不断呼吁采取更加务实的策略,要求对“全球南方”战略进行重新思考,甚至主张“放低身段”以换取南方国家的支持与合作。^③在他们的认知中,中国被视为“全球南方”的“领头羊”,同时也是美国面临的最大

^① Eline Blot, “Sourcing Critical Raw Materials through Trade and Cooperation Frameworks,” <https://ieep.eu/wp-content/uploads/2024/03/Sourcing-critical-raw-materials-through-trade-and-cooperation-frameworks-IEEP-2024.pdf>.

^② [巴西]阿马多·路易斯·塞尔沃、陈迎春译:《巴西崛起与全球新秩序》,《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6期,第54~66页。

^③ 参见 Kadri Liik, “From Russia with Love: How Moscow Courts the Global South,”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2023/12/From-Russia-with-love-How-Moscow-courts-the-global-south.pdf>; Anthony Dworkin,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in Flux: Strengthening European Cooperation with the Global South,”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2023/11/Multilateral-development-in-flux-Strengthening-European-cooperation-with-the-global-south.pdf>.

“地缘政治挑战”与“系统性竞争对手”。据此逻辑,若能成功遏制中国的崛起,“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将大幅削弱,从而有助于维护乃至重塑旧有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为此,美西方国家围绕中国在“全球南方”的角色和作用,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 话语层面:将中国与“全球南方”进行区隔

国际话语塑造不仅仅是一国表达自我主张,更是一个通过影响他者、获得认同,使之成为广泛共有话语的政治过程。^①二战后,西方世界通过构建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遍性叙事,取得了对他国进行“贴标签”的权力。如今,“全球南方”有着天生的概念模糊性,美西方国家则充分利用这一特性,刻意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制造差异。

第一,制造新概念,切断中国与“全球南方”的身份联结。例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称,俄乌冲突正促使世界“重新朝着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组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由美国和欧洲领导的“全球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领导的“全球东方”,以及印度、巴西等组成的“全球南方”三大群体。并且,“全球西方”与“全球东方”都在争取“全球南方”的支持。^②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西方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权力将在“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之间重新分配。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可能基于自身现实利益考量,而非价值观因素,向“全球西方”靠近。为此,西方需要采取“基于价值观的现实主义”策略,与南方国家共同构建一个全球体系。^③

第二,处心积虑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全球南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一旦某国通过经济持续增长晋升为发达国家,其“全球南方”身份便不再适用,韩国便是一个典型案例。2021年7月2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了韩国地位变更案,正式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美国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

① 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156~174页。

②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pp. 121 ~ 138.

③ Alexander Stubb, “The West’s Values Are Important, But So Is Realism, Says Finland’s President,” <https://www.economist.com/by-invitation/2024/07/04/the-west-s-values-are-important-but-so-is-realism-says-finlands-president>.

南方”之外,通过舆论和法律手段剥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这一策略在贸易和气候谈判领域尤为明显。在贸易领域,美国不再遵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而是将关税、市场准入等贸易安排与产业、环境、投资、劳工以及监管框架等制度紧密挂钩,甚至将政治体制和人权因素嵌入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构建起基于意识形态的“民主国家联合体”,以限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在气候谈判方面,2022年9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基加利修正案》时,就明确要求国务院向联合国提议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①2023年3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全票通过了《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要求取消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同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通过此法案。^②

第三,炮制有关中国的负面叙事,拉大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心理距离。自从特朗普总统任期内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美国全方位加强了对中国的舆论战,其力度、频次和规模均呈上升趋势,手段也日益翻新。在美国带动下,欧洲、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都出于不同目的选择性加入,逐步形成了对华负面舆论的“大合唱”。“债务陷阱论”“生态威胁论”“中国经济登顶论”“产能过剩论”“生态威胁论”等不一而足。这些论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论证中国“以不正当手段在世界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仅损害了美西方的产业利益和就业岗位,冲击南方国家的相关产业和市场,还有沦为“中国的胁迫外交对象手段”的风险,需要全世界共同抵制。这些舆论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南方国家及其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如印尼前总统佐科对中国过剩产能冲击印尼市场的担忧,明显呼应了西方的“产能过剩论”;土耳其、巴西也对中国电动汽车、钢铁等关键产品的低价出口表示担忧。

(二)扶持印度争夺“全球南方”内部领导权

“分而治之”是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全球治理策略。^③中印边界冲突与战略

① “Amendment to Montreal Protocol,” <https://www.congress.gov/treaty-document/117th-congress/1/resolution-text>.

② “S. 308 - Ending China's Developing Nation Status Act,”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308>.

③ 陈积敏、王寅鹤:《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24年第8期,第121~140页。

竞争给美西方挑起中印在“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提供了契机。近年来,印度经济的稳健增长为其实现战略意图奠定了坚实基础。莫迪政府试图抓住时代变局,凭借左右逢源的外交策略,将印度塑造成“领导型大国”^①或“世界大国”,并将“全球南方”视为实现这一战略抱负的重要抓手。为此,印度积极发挥传统外交资源,先后举办三次“全球南方”峰会,而中国和巴基斯坦均未受邀参加。莫迪在2024年8月第三次峰会中声称,“中国向贫困国家提供贷款可能会造成‘债务陷阱’”,而印度主导的“全球发展契约”则“不会以发展融资为名让贫困国家承受债务负担”。^②可见,印度已将控制“全球南方”及遏制中国影响力视为实现“全球南方”领导权的战略考量。

针对印度寻求“全球南方”领导地位的诉求,美西方给予了积极支持。例如,《外交政策》期刊总编辑拉维·阿加尔瓦尔明确指出,支持印度抗衡中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③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前成员拉贾·莫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中印在“全球南方”领导地位之争是争夺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并力主印美联合以遏制中国崛起。^④为此,美国在多个领域和层次为印度提供支持:一是舆论支持。在2023年8月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刻意抬高印度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将其塑造成印度洋的“管理者”,并强调印度在应对中国在印度洋的“灰色地带”威胁方面发挥主导作用。^⑤二是重大项目支持。同年9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主导发起了“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项目,并将其提升至“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增长能力”的战略高度。^⑥三是产业支持。美国通过“四方安全对话”“印太经济框架”等机制,推动其在全球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及清

①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1期,第1~15页。

② “PM Modi Proposes ‘Global Development Compact’ at Global South Summit,” <https://www.ndtv.com/india-news/pm-modi-proposes-global-development-compact-at-global-south-summit-6360327>.

③ 尼基尔·伊南达尔:《印度、中东和欧洲的“三方经济走廊”能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business-66981660>。

④ C. Raja Mohan, “The Future Will Be Made in America,” <https://www.newstatesman.com/international-politics/geopolitics/2023/10/future-america-raja-mohan>.

⑤ Lisa Curtis, “Countering Coercion: Managing Chinese Gray Zone Activ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countering-coercion>.

⑥ “Everyone Wants the IMEC, But Not for the Same Reasons,”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india-europe-trade-imec/>.

洁能源等领域的产业链供应链向印度转移。例如,2022年应美国政府要求,苹果公司将其在中国的部分生产线迁往印度。四是安全与防务支持。近年来,美印军事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军事交流的内容、规模和层级逐年攀升,军事援助、武器销售及技术合作不断深化,联合军演的频率和类型也显著增加。

(三) 碎片化策略:拉拢部分国家加剧“全球南方”分裂

美西方不仅在“全球南方”内部挑起领导权之争,还通过实施差异化援助和施压等手段,拉拢、打压和利用不同类型的南方国家,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南方”的碎片化趋势。^①

第一,在发展援助方面,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后,美国迅速意识到“全球南方”最为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发展而非地缘政治。为此,拜登政府大幅增加基础设施项目投入,相继提出“重建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项目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等多项倡议。欧盟紧随其后,发布“欧盟—非洲:全球门户投资计划”;英国则积极开展对非港口投资。这些发展援助措施,本质上是旨在通过提供发展资源,实现对南方重点国家的外交突破,从而制约中国在南方国家的影响力。

第二,在气候援助方面,太平洋岛国和非洲国家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匮乏、基础设施落后,遭受气候灾害的影响尤为严重,外援几乎等同于国家发展的命脉。美西方从战略竞争的角度出发,不仅在多边场合优先关注最脆弱国家,还通过美国—东盟、美国—太平洋岛国、美国—非洲等双边峰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或其他援助承诺,以巩固和扩大在南方国家的影响力。

第三,在供应链管理与调节方面,美西方国家深刻认识到,中国的战略优势在于制造业生态体系,要“竞赢”中国,就必须推动清洁能源、信息技术、生物制药等高价值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为此,它们出台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政策,包括针对本土的“在岸外包”、针对北美的“近岸外包”,以及针对东南亚、韩国的“友岸外包”。跨国公司也顺应这一地缘政治逻辑,将自主可控和安全韧性作为

^① 周弘:《国际援助与中国在全球南方争夺话语权的多样性与共同性——一种全球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67~187页。

产业布局的核心因素。这意味着部分南方国家,尤其是越南、印度和墨西哥,可能会成为美西方国家此轮供应链管理的获利者。

第四,在提升新兴经济体国家国际存在感方面,美西方通过邀请这些国家参与各种高峰论坛,加强了与它们的互动。2022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德国邀请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塞内加尔和阿根廷五国;2023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则邀请了巴西、菲律宾、加纳等国,并专门安排了题为“重新校准指南针:南北合作”的讨论;同年5月,七国集团峰会东道国日本也邀请了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参会。到了2024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和七国集团峰会的受邀“全球南方”国家数量更是创新高。这些措施表明,美西方国家在与“全球南方”展开对话时,外交姿态趋于灵活,适度放弃了以往居高临下的姿态,转而寻求更为开放、平等的对话模式,^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南方国家参与国际事务、表达自身利益的诉求。

三、美西方政治操纵“全球南方”的潜在效果分析

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政治化操纵不但在中国和南方国家之间制造摩擦与隔阂,还制造中印战略竞争的舆情,同时持续联合盟友谋划排他性国际发展项目。然而,从整体效果来看,其负面影响明显大于正面效应。此类政治操弄不仅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态势,促使更多南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来应对当前国际秩序,而且从服务美西方战略利益的角度来看,短期内难以取得显著成效。

(一)地区及次地区战略竞争态势显著升级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政治和战略压力显著加剧。一方面,这些国家在与俄罗斯、中国的交往中遇到更多来自第三方的障碍。尽管多数南方国家未追随欧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南非、印度等国在举办金砖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论坛时,面临是否邀请俄罗斯的尴尬抉择,这反映出美西方外交战略对

^① Erica Hogan and Stewart Patrick, “A Closer Look at the Global South,”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4/05/global-south-colonialism-imperialism?lang=en>.

南方国家发展环境的深远影响,与美西方直接对抗并非这些国家的政策首选。另一方面,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区的政治生态明显恶化,周期性选举引发的不同政党和社会团体对发展路线的争议加剧,内部治理和对外政策摇摆不定,^①社会撕裂程度加深,地区机制遭受冲击,运行效率下降。同时,抵制选边战队的平衡外交压力日益加大,“全球南方”许多地区形成“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共识,强化内部团结成为应对困境的主要策略。但美国试图从经济上打破南方国家对中国的依赖,通过散布舆情、利用外交资源施压等手段,制衡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间的战略竞争氛围明显增强。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关注南方积极追赶北方的进程,却忽视了“全球南方”内部的竞争同样激烈。由于“全球南方”国家数量众多、发展基础和能力各异,多边发展议程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美西方的政治操纵将原先“普惠型”的贸易投资规则转变为“高标准”“公平性”和“对等性”,^②赋予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南方国家优惠条件,创造选择性激励,导致部分南方国家不得不从地缘政治和美西方关系角度审视发展问题。一些南方国家秉承实用主义策略,如越南、印度、墨西哥和太平洋岛国等,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调整供应链步伐,采取多种政策诱导西方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他们转移,以提升自身制造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保持紧密对话交流,争取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此外,美西方的政治操纵还加剧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国、巴西、印度、土耳其、印尼、南非等新兴经济体虽拥有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但其发展进程仍高度依赖欧美的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这种依赖性使美西方能够对其施压以配合其战略意图。因此,巴西、印度、土耳其、印尼等国家既与美西方集体竞争,也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技术创新和市场占有方面进行战略竞争,导致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迅速上升。

① 张芯瑜:《拉美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识与回应》,《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4期,第64页。

② 黄河:《国际直接投资规则的新变化及其对金砖国家的影响与挑战》,《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55~63页。

第三,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的国际接受度有所下降。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高,要求中国承担与其实力相当的国际义务和责任。2021年,中国GDP相对美国占比达到历史性的77%,但在2022年下降到70%,并在2023年进一步下降至65%;^①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仍超过七国集团国家总和。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前景依旧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支柱。2024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其他大国将在未来十年内变得更强大。^②在气候变化领域,要求中国加大减排力度的呼声增多;在气候援助方面,中美责任竞赛气氛浓重,美国甚至将自身出资数额和比例要求与中国的贡献挂钩;在经贸方面,部分南方国家希望中国按照美西方标准开放市场,并给予更多单边优惠待遇。这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在诸多重大国际场合,中美对比成为讨论焦点,而非与印度等南方国家之间的比较,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被逐渐淡化。

(二)美西方对“全球南方”政治操弄效果不彰

尽管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政治操弄有所进展,部分南方国家在立场上表现出摇摆或实用主义倾向,但总体而言,这些措施难以取得显著成效,无法实质性改变当前国际秩序结构,更无法逆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第一,“全球南方”的独立性有增无减。虽然美西方为实现其战略竞争目标,通过更强的安全机制迫使少数国家选边站队,邀请更多国家加入其主导的非正式机制,增加援助和投资以拉拢特定关键国家等。然而,这些国家虽不会拒绝参与“民主峰会”“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相关议程,但也明确表示不愿卷入“新冷战”或在大国竞争中明确站队。他们担心大国地缘政治竞争会破坏其所在地区的稳定与发展。在和美国保持密切交流的同时,这些国家也加强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贸联系与安全对话,绝不轻易突破中国、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底线。

① 根据世界银行国别GDP数据计算。

② Tobias Bunde et al., eds.,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4: Lose- Lose?”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ssets/01_Bilder_Inhalte/03_Medien/02_Publikationen/2024/MSR_2024/MSC_Report_2024_190x250mm_EN_final_240507_DIGITAL.pdf.

第二,“全球南方”团结性并未受到实质性削弱,积极不结盟仍是大多数国家的首选。虽然美西方的货币政策、经贸状况以及经济复苏程度是“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但总体来看,通过团结寻求发展机会仍是主流共识。从价值链上突破被锁定低附加值位置和单向依赖欧美市场需求,依然是“全球南方”共同的根本利益。世界经济论坛《2024 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对全球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持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满与日俱增,一批不断演变国家正在国际舞台的多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这表明,尽管面临美国施加的越来越大的选边压力,南方国家团结的动力依然源于国际秩序固有的结构性压力以及追求自主发展的迫切需求。

第三,中国在“全球南方”的接受度不减反增。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中的领导力和影响力是美西方开展“全球南方”政治操弄的重大诱因,但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南方国家开展了广泛的务实合作,不仅推动了南方国家整体性的发展,也增强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皮尤研究中心对 35 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与 2019 年相比,中国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有所增强。此外,被调查的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对中国影响持积极态度。^②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期待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事务与外交战略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中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持续扩大;^③塞尔维亚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学者则预计,中国将在当前全球秩序中发挥更大作用。^④

(三) 美西方控制和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下降

第一,西方意识形态吸引力下降。二战后,美西方通过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

①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The_Global_Risks_Report_2024.pdf.

② Laura Silver et al., “Most People in 35 Countries Say China Has a Large Impact on Their National Economy,”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4/07/09/most-people-in-35-countries-say-china-has-a-large-impact-on-their-national-economy/>.

③ Ivan Lidarev,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Balkans: Impact, Regional Responses, and Larger Implications,” <https://lseideas.medium.com/china-us-competition-in-the-balkans-impact-regional-responses-and-larger-implications-dcab70837933>.

④ Predrag Petrovic et al.,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Dis) Order,” <https://bezbednost.org/wp-content/uploads/2022/12/BSC-trends-fin-web.pdf>.

观获得了广泛的意识形态吸引力,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也因此确立了西式民主制度。然而,近年来,美西方国内政治极化、选举扭曲、经济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议程和价值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在过去四十年取得的经济增长奇迹已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一定需要沿袭西方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为其他国家选择自身独特发展路径提供了借鉴。在这一过程中,西式民主的神话被打破。此外,在“全球南方”国家看来,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只是推动阵营化的工具,而非真正有效地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资源。

第二,“全球南方”的横向联系明显加强,获得了更多的战略回旋空间。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中,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技术水平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形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传统的南方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产业链、价值链、贸易和资本形成了双向闭环流动。然而,冷战结束后,以控制约束发展中国家为本质特征的国际分工体系,逐渐转变为由西方、资源国、生产国以及中国等多方共管的政治经济循环态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不同国家在不同环节中所拥有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与其自身实力相符。这使得原有的双向闭环关系转变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欧美之间的三边环流,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过去发达国家的角色,帮助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与欧美经济实现更为平衡的对接。此外,非洲国家对原宗主国过度依赖的局面也得到大幅改善,经济内循环日益增强。这就部分突破了过往欧美长期主导的南北垂直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让-马克·里克利和理查德·卢卡奇指出,“全球南方”主要经济体试图通过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并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金砖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平衡美国及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①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莉莉·麦克艾尔维持类似观点,认

^① Jean-Marc Rickli and Richard Lukacs, “The Chief Geopolitical Officer: Guiding Business in a Polarised Global Era,” https://dam.gosp.ch/files/doc/ssa-2024-issue37?_gl=1*_1hqg8l*_gcl_au*_MTU3MTkzMjgzLjE3MjEwMjkzMzg.*_ga*_MTA4OTEwMDA4MS4xNzA3OTc3Njc1*_ga_Z66DSTVXTJ*_MTcyMzE4MzEwMy4xMi4wLjE3MjMxODMxMDMuNjAuMC4w.

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深化,正“削弱西方所建立这种国际秩序的努力”。^①

第三,美西方以市场开放来满足“全球南方”利益的意愿下降。近几十年来,开放贸易让“全球南方”数以亿计的民众摆脱贫困,也成为美西方与“全球南方”改善关系的主要砝码。然而,美西方推出的“新华盛顿共识”将市场开放置于一边,转而以巨额补贴虹吸产业回流,美元“暴力”加息更进一步加剧了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和发展困境。目前,美西方还试图通过调整各种贸易规则,对“全球南方”实行差别化管理,明显降低了对“全球南方”的整体市场开放度。2024年8月2日,美国商务部最终否决了将越南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列表中剔除的请求,这表明尽管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拉拢越南,但仍无法阻止其在经贸领域开放意愿的减弱。此外,在数据流动、气候变化等新兴规则的博弈中,欧美同样以自身战略利益为依据,出台跨境战略法案和配套细则,强化对自身数据和低碳技术资源的掌控能力,并加大对“全球南方”的管控力度。这些举动均表明,美西方在满足“全球南方”利益方面的能力正在全方位下降。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美西方对“全球南方”的政治操弄体现为一种“全方位、多议题的混合政策议程”,^②深刻影响了“全球南方”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方向、性质与程度,对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保持清醒的战略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采取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应对措施,来有效规避美西方设定的议题陷阱,并坚定地支持和帮助“全球南方”赢得发展的主动权和话语权。

(一) 坚守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做好“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

美西方政治操弄“全球南方”议题的核心意图之一是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之外,试图通过变更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等手段使中国失去该身份。对

^① Craig Cohen and Alexander Kisling, eds., “2024 Global Forecast: A World Dividing - Part I The China Challenge,”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2024-01/240125_GlobalForecast_2024_ChinaChallenge.pdf.

^② 赵建伟:《美国战略学术界对“全球南方”的认知与辩论》,《国际论坛》2024年第4期,第65~86页。

此,中国应明确立场: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并坚定不移地维护这一身份。首先,在身份上坚持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同。中国是亚非万隆会议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和亚非拉国家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二战后又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争取国际公平秩序,彼此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历史友谊。这种战略遗产应长期坚持。其次,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知。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定义,一般来说依据人均GDP或是否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来衡量。2021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主要是基于其人均GDP水平。尽管中国的人均GDP有所提升,已超1.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门槛条件;但中国的整体发展依然不平衡,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仍存在显著差距,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指标差距更大,尚不足以全面履行发达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再次,从道义和价值观上应继续坚定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当前国际秩序仍存在结构性不公,尽管美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能力有所削弱,但仍能通过军事武力、意识形态渗透及多边机制等诸多途径干涉南方国家的内政和外交,南方国家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作出妥协。因此,中国应基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更多地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为正义发声,明确表示“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和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①最后,有必要采取法律手段巩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美西方不断通过国内立法的方式将中国与南方国家区分开。对此,中国要在多边外交场合捍卫自身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并有必要适时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和巩固这一身份属性。

(二) 确保发展议程在“全球南方”的核心地位

面对美西方将“全球南方”进行政治化和工具化,中国应揭露并批判此举的错误性和误导性,积极引导国际议程回归“发展”这一核心主题。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冷战阴霾下的亮点,^②很大程度上源于该会议围绕新独立国家如何处理殖民主义遗产、如何实现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这两大核心问题展开。

^① 《“纪念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蓝厅论坛举行》,《人民日报》2021年6月26日,第4版。

^② 宋念申:《发现东亚》,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页。

时至今日,将近70年后,“全球南方”的主题已不再是主权和政治独立,而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发展成为“全球南方”的核心命题。遗憾的是,当前“全球南方”的发展困境不仅未见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根据202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全球有超过11亿人生活在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占覆盖总人口的18%以上,其中六分之五的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5.34亿人)和南亚(3.89亿人),近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7.3亿)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23/2024年人类发展指数报告》也显示,全球的发展进程已偏离既定轨道。2023年的全球各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均低于2019年之前的水平。尽管经合组织国家已经全部从2020年或2021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下滑后恢复,但最不发达国家中仍有51%尚未实现复苏。^②此外,近期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目前仅有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顺利,近一半目标进展缓慢或成效不显,超过三分之一的目标停滞甚至倒退。而俄乌冲突和美元通胀则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困境,多重危机使得诸多国家不得不转向满足基本需求的“生存模式”。^③

面对充满挑战的发展前景,中国应始终重申将发展置于各项议程的核心。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重视全球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中国还应反复明确立场,不参与所谓的“全球南方领导力”竞争,而是与相关国家携手,共同推进“全球南方”的发展议程。例如,中国可适时发布《中国—全球南南合作白皮书》,阐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立场和愿景,并在各种国际场合主动发声,参与“全球南方”话语权的构建,与“全球南方”一同拥有“全球南方”的解释权,真正体现中国作为“全球南方”成员对发展权益的责任担当及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坚定支持。这一立场与美西方将“全球南方”视作战略资

① OPHI and UNDP,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2023,”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dp-document/2023mpireporten.pdf>.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3/2024,”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global-report-document/hdr2023-24snapshotch.pdf>.

③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4,”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4/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4.pdf>.

源和地缘政治工具、试图构建“小圈子”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①

(三) 用好现有各种机制和平台,整合“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

群体性崛起的“全球南方”正在改变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②西方世界所建构的有关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指导原则,已经越发不能适应“全球南方”呈现出的多元现代化发展趋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重建成为“全球南方”的根本利益所在。^③中国应继续与“全球南方”协调立场、达成政策共识,在国际规则制定和议程设置中体现“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权威平台上积极推动国际规则体系改革,应对发达国家在数字和绿色领域的新规则,确保发展中国家享有最大程度的单边优惠;第二,加强与“七十七国集团+中国”的合作,通过与七十七国集团秘书处、南方中心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等联合国南南合作相关机构层面的战略合作,以共设议题、开展联合研究、联合举办专题研讨、设置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等方式推进发展议程,中国可酌情增加对这些机构的资金和项目支持;第三,依托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平台,秉承“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④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沟通,协调彼此利益诉求和发展目标,凝聚更多发展中国家力量,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经济秩序。通过机制内成员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来挖掘和培养更多合作增长点,使更多的南方国家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交流与合作网络。第四,借助中国与地区性组织对话机制,依托中非合作论坛、中阿合作论坛和中国—拉共体论坛等论坛机制,深化“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南南合作网络。其中,中阿合作论坛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协作和南南合作的标杆。

(四) 注重实效、拓展合作领域

美国将对“全球南方”的拉拢作为其进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主要工具。中

① 杨慧:《“全球南方”的兴起、分化与中国的选择》,《外交评论》2024年第2期,第1~23页。

② 陈明琨:《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权力的转移与国际秩序的复合型转向》,《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2期,第70~84页。

③ 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12页。

④ 张蛟龙:《金砖扩员与全球治理变革》,《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4年第5期,第106~124页。

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无需刻意进行拉拢或者强行争取,否则不仅可能加剧地区政治生态紧张局面而适得其反,还可能坐实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舆论恶感,引发更浓重的“新冷战”疑虑。中国需要做的是让“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自主独立,而非“一边倒”或站队。因此,中国应聚焦“全球南方”的关键诉求和优先发展目标,加强发展合作对接,以务实的成效来抵消美西方的地缘政治议程。比如,中非合作议程应与非盟《2063年议程》紧密对接,非洲学者也呼吁要“改革全球金融架构、打破债务与气候关系”“不能以牺牲近五分之一的人民为代价来拯救地球”。^①中国应充分响应这一诉求,利用绿色能源领域的优势,帮助非洲等南方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如今,中拉合作也逐步从相对疏远走向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拉合作要关注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确保重要矿产和农产品顺利对华出口。更广泛而言,中国还需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合作成效,完善合作机制和贸易平台,形成一批标志性、标杆性和示范性项目。目前许多南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其国内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认为中国企业在当地建厂是当地经济的推动力而非威胁。同时,中国需谨慎规避美西方内向化的市场封锁,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中国要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平台,加强与南方国家的政治和经贸合作,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真正推动全球发展共同体建设,体现中国的大国担当。

五、结 语

国际秩序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期。“全球南方”在俄乌冲突中不盲从西方、坚持独立政治立场的态度,让西方社会认识到“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大力量。美国意从“全球南方”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至少不希望“全球南

^① Mo Ibrahim Foundation, “Africa on the Road to COP28: Reconciling Climate & Development,” <https://mo.ibrahim.foundation/sites/default/files/2023-11/africa-on-the-road-to-cop28.pdf>.

方”成为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来赢得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并消除俄罗斯的威胁。因此,美西方将“全球南方”视为针对中国的活动场域和话语工具。“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体系依然深受西方文化霸权的深刻影响,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处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边缘,形成了对美西方的单向度依赖。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多元性、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也为西方利用“全球南方”设置话语陷阱、分化离间创造了条件。

目前,美西方采取了多种策略让“全球南方”为其所用,包括将中国从“全球南方”中区隔开来、扶持印度作为领导国、拉拢部分南方国家等方式。这些措施在遏制中国、孤立俄罗斯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各地区的政治生态发生明显变异,大多南方国家已为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做好准备,少数国家甚至利用这一竞争谋求发展资源。然而,整体而言,美西方对“全球南方”进行政治操弄来服务其战略利益的效果不彰,“全球南方”崛起的结构性状况很难被打破。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战略自主持续提升,他们在中美以及俄美之间推行平衡外交和多元外交,拒绝选边站。西方在“全球南方”面前首次感受到“权力的虚弱”,^①“试图通过拉拢‘全球南方’来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②的努力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开始根据“全球南方”的行为来校正自己的大国博弈策略。^③

就中国而言,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正确的做法不是复制美西方的做法,以地缘政治对抗地缘政治,以竞争对抗竞争,而是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自我认知,积极利用各种机会和平台为“全球南方”争取发展权,力所能及地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此获得最大的战略空间和发展空间。

① [巴西]阿马多·路易斯·塞尔沃,陈迎春译:《巴西崛起与全球新秩序》,《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6期,第54~66页。

② Pankaj Mishra, “The West Never Had a Chance at Winning over the World,” <https://www.tbsnews.net/thoughts/west-never-had-chance-winning-over-world-742170>.

③ Nour Dados and Raewyn Connell, “The Global South,” *Contexts*, Vol. 11, No. 1, 2012, pp. 12~13.